

# 从场景到行为：国际视野中的 公共空间手机使用研究

洪丹阳

**摘要：**文章通过将国外实证研究文献与相关理论进行嵌合，考察了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电子媒介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借鉴“媒介—场景—行为变化”的研究思路，分析手机的介入对公共场景中人们的行为感知、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手机；公共空间；拟剧理论；不在场的在场；社会互动

**作者简介：**洪丹阳，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8) 03-0119-06

## 一、研究缘起

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传播领地，即便身处嘈杂喧闹的公共场所，通过手机，尤其是小巧便捷的智能手机，人们依然可以自如地处理工作事务，进行私人通讯，获取信息，开展社交等。手机让使用者得以短暂地忽略现实环境，甚至无视旁人，沉浸在由各种手机应用所构建的临时性的私人空间。2016年德勤对中国移动消费者调查发现，手机使用最为频繁的活动是在乘坐公共交通时，74%的调查者会高频（几乎总是和非常经常）使用手机；在外出聚会、就餐、购物、娱乐等公共场景里高频使用用户均超过半数。<sup>[1]</sup>随着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电子媒介广泛地渗透到各个层次的公共场景，对“低头族”现象的不满以及对手机使用不文明行为的反感，<sup>[2]</sup>社会区隔加剧的忧虑等议论屡见报端。这些批评的声音是否有据可查，手机使用行为和公共场所秩序之间有什么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更多严谨科学的论证提供支持。而在新媒体领域，国内学界目前最关注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微博、微信等某些具体的传播内容，很少将手机视作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来考察媒介本身带来的社会影响。反观国外传播学界，2000年初就有相关理论著述问世，相当一部分已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sup>[3]</sup>近年来，西方研究者开始采取实验法、观察法、问卷法等多种实证方法对这一议题展开研究，视角多元，方法各异。

本文从现有的国外文献入手，包括在EBSCO传播学与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搜索，遴选出相关研究文章。同时，排除部分研究手机传播内容的文献，尽可能选择研究对象为手机技术本体的学术文章。另外，借鉴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路径来理解这些稍显零散的文献，以技术为切入点，正是媒介环境学派一贯的主张——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出发，研究媒介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解读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该学派不乏麦克卢汉、莱文森等声名显赫的学者，并有诸多著述传世。不过，区别于传播学经济学派和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派作为研究范式，

主要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直觉的洞察思辨为新媒介的社会影响做阐释性探索,而非要提供一个可供科学检验的方法论。本文同样将其理论观点作为参考性的资源,通过将国外文献与媒介环境学者梅罗维茨、莱文森,以及社会学家戈夫曼、心理学家格根的观点进行嵌合,检视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电子媒介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对人们的场景感知、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二、公共场景感知与手机使用态度

在梳理过程中首先发现,有多个研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戈夫曼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的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就好比在舞台上表演戏剧。<sup>[4]</sup>对戈夫曼和大多数的场景主义者来说,他们关注存在于某个场景以及与该场景相匹配的行为,例如,“前区”指代公共空间,这一场域的行为偏向舞台表演性社交自我展示,“后区”象征私人空间,允许人们呈现相对放松的状态。<sup>[4] (149)</sup>行动者对于“前区”和“后区”等每一种特定场景都有明确的界线,场景以及和这个场景相匹配的角色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手机的介入打破了前后区的隔离状态,其使用行为不仅是与通话者互动,也要考虑到在场人的反应。根据戈夫曼的解释,公共场所的规范行为取决于共在者的焦点所在和角色要求。当面对专注的互动对象,即“焦点”程度很高的对象,即使不需要参与到集中互动的人们也被期望要表现出一定的规范参与。<sup>[5]</sup>

戈夫曼用“焦点”来描述人与人之间接触交往的程度,在密歇根大学传播学者 Scott Campbell 的一系列手机通话研究里,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在不同类型的公共场所期望人群参与的程度。在评估不同的地点时,Campbell 发现,受访者们认为在剧院或教室这种由单一事件或活动主导的公共场所尤其不适合进行手机通话,而在那些缺乏中心焦点的地点,如商店和人行道,手机通话行为更容易被接受。<sup>[6]</sup>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手机用户来说,中心焦点起到的效果是有区别的。Campbell 通过后续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对公开使用手机的态度,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来自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参与者的看法更相近,来自瑞典和美国的参与者更相近。<sup>[7]</sup>随后,针对来自 34 个国家的 256 名国际学生,Campbell 利用问卷调查探究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是否可以为这种跨文化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调查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倾向者对没有中心焦点的道路、商店等公共场所的手机通话行为容忍度更高,个人主义倾向者对有中心焦点的剧场、教室等地点的手机通话行为更难容忍。之所以存在如此相关性,Campbell 的猜测是在没有中心焦点的场所,即不明显干扰他人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倾向者热衷于通过通话维持个人的社群关系;而对于个人主义倾向者,起作用的可能不是公共活动焦点,而是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时被他人打扰。<sup>[8]</sup>在 Campbell 的基础上,沙特阿拉伯的学者以研究文化内部差异为出发点,考量本国年轻人的手机使用态度。研究者发现,本国年轻人不仅无法忍受他人在清真寺和教室进行手机通话,在这两个场合受访者本人也不会使用手机通话。而对于商店、公用卫生间、人行道等公共场合,沙特年轻人对手机通话行为普遍表示接受,并且相对来说女性和职场人士公开进行手机通话的次数更加频繁。<sup>[9]</sup>除了性别和职业,韩国学者 Han 发现,年龄作为文化内部变量也会带来公共空间手机使用行为的差异化:在 20 岁以下和 40 岁以上两个组别的调查对象里,相较于他们的长辈,韩国年轻人更倾向于将手机设置为响铃模式并公开接听电话,同时对公共空间手机使用规范行为的接纳度更低。<sup>[10]</sup>为了让人们保持注意力集中,一般而言有中心焦点的公共场景相对封闭,没有中心焦点的场景则更加开放,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并无明确焦点但却是封闭的社交场景,如电梯、公共交通工具等,在这类属性模糊的公共场景里,所属国家、年龄段等变量会导致人们对手机使用的态度有差异。<sup>[11]</sup> Okabe, Matsuda&Ito 的研究就曾揭示受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在日本公

公共交通上使用手机通话，日本受访者也反对在该场景中使用手机，尤其是手机通话行为。<sup>[12]</sup>

以上研究虽然不完全是讨论具体的手机行为，但个体对他人行为容忍程度也能够反映出对自身的行为要求。公共空间的中心焦点程度、手机用户的价值取向、跨文化的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变量，都可能影响人们的手机使用认知。这些研究的实用意义还在于，提醒决策者要参照变量来设置情境合宜的“手机礼仪”（m-etiquette），<sup>[9] (235-251)</sup>而不是一刀切地去规范公共空间中的手机使用。

### 三、移动社会场景与行为表演的即时变化

事实上，将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引入传播学研究有先例在前。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梅罗维茨就把拟剧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嫁接。不过，戈夫曼是以有形地点为界来区分场景，而梅氏则把社会场景看成是超越地域的“信息系统”，即决定人们互动的性质的是信息流通的模式，并非是包括地点或场所的自然环境。他相信，新媒介的广泛采用必然带来信息传播系统的改变，相应地将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场景，并进一步要求行动者采取新行动来适应。<sup>[13]</sup>

关于手机带来的场景演化，季念的《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等文章对200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介绍，<sup>[14]</sup>这里不再赘述。参照梅罗维茨的思路，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旦手机使得私人空间介入到公共空间，新型场景出现，个人或他者适应性的行为调整。和梅罗维茨一样，罗格斯大学手机传播研究中心主任Katz也很关注新的媒介引发行行为变化。对Katz来说，手机传播过程是个体在分享、穿过、占领公共空间中身体表演的一部分，这整个场景就好像是一出“舞蹈”，不仅通话者，用户的共在者们也在空间和节奏上进行某种行为上的自我调整，使得被手机打断的社交互动能够顺畅运行。通话者和身边的伙伴以及那些恰巧在现场的陌生人共同编排（choreography）的“舞蹈”，维系了社会互动中需要的同步性（being in sync）。<sup>[15]</sup>举例来说，在一个密集的公共聚集场所，突然一声铃响或者旁若无人的低语接听，会中断人们正在进行的集体活动，所有的视线都可能转向手机通话使用者；而在开阔的公共空间中，被侵扰的人们主动绕道而过，给通话的人腾出更宽阔的空间。在日本社会，为表示对个人隐私的尊重，通话开始时，共在者会表现得专注于另外的活动，来表示没有听到通话者的谈话，在他们听到通话快结束前以视线引导的方式将注意力转移到通话者身上。<sup>[15] (62-71)</sup> Katz用这些动态的场景行为以及微妙的身体语言，形象地描述了一幕幕移动传播场景里的社会表演，在这个混合场景里，前区与后区的二元界线被打破，私人与公共的状态频繁流转。

Katz的解读主要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umphreys花了一年时间定点观察，再结合深度访谈来了解公共空间中的手机使用和交往协商行为。他在餐厅、咖啡馆、图书馆、学生中心、机场、火车站、街道等地点看到了许多和Katz的发现类似的情景：通话进行时，在场的同伴都会用望向别处或稍微远离为通话者创造一个相对的私人空间。Humphreys用戈夫曼的“礼貌性疏忽”概括上述行为，说明人们会谨慎地回避与他人不恰当的互动，以维持公共场合秩序。但在访谈里，受访者却坦白虽然表现得并不在意，他们经常还是会听通话者的对话，尤其如果手机那端也是熟悉的对象，或者谈论的事情和自己有关。Humphreys多次观察到，通话者在接听电话的同时会用眼神或非口语方式，跟身边同伴保持沟通，如同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前区”进行表演，有的时候通话者会让同伴也加入电话谈话。<sup>[16]</sup> 借由这些极为细致的观察，Humphreys回应了Hopper所谓的“呼叫者霸权”现象，即一种在通话过程中，呼叫者和接听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sup>[17]</sup> Humphreys认为，手机用户不仅会利用手机的内置功能制衡呼叫者的权力，由于手机的移动属性允许接听者可以在通话时继续保持和身边同伴的社会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电话时代“呼叫者霸权”的设定。<sup>[16] (810-833)</sup>

从 Katz 与 Humphreys 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从身体语言和行为表演来了解手机传播和社会互动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很直观的进路。对于梅罗维茨来说,新场景行为可以转变为可预测的模式,他还以戈夫曼的后区和前区概念为基础,称混合场景中出现的 new 行为为“中区”行为。戈夫曼认为,场景界限的打破,只是不正常和暂时的,但梅罗维茨相信随着时间的增长,中区行为足以产生出新的公众风格——如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成年和童年的模糊以及政治领袖与普通百姓的融合等。<sup>[13]</sup>要说明的是,梅罗维茨把这些社会现象成因笼统归结于电子媒介的影响在现在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sup>[18]</sup>这也让梅氏理论饱受争议。Katz 和 Humphreys 的研究,考察的还是特定场景行为的即时变化,毕竟要衡量手机对社会行为的长期影响,还要综合考虑媒介以外的多重社会因素。两位研究者都建议,还可以从心理—社会因素的层面来探究移动技术是如何反映和影响社会关系,或许从中可以发现未来社会交往模式的线索。

#### 四、“不在场的在场”对社会互动的影响

同样承袭麦克卢汉衣钵的莱文森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写道,“手机的固有属性是社会性工具”<sup>[19]</sup>,我们不能只是孤立地考虑它对个体的影响,还要考虑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无论他人是否在场。莱文森从手机的社会维度展开,认为手机的存在影响了这个场景里的社会关系。相比行为表演,要讨论手机对公共场景社会关系的影响,就要涉及更深层次的心理学研究。从理论上说,心理学家 Gergen 关于“不在场的在场”(absent presence)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框架。“不在场的在场”,指在社交场合中一种身体在场,但注意力已经被传播技术媒介化的其他世界所吸引的现象,“人们沉浸在私人空间而不是集体世界”。虽然阅读报纸、书籍等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手机会大大加剧这种“不在场的在场”,因为其双向对话性更容易让人们完全沉浸在虚拟空间里,进而完全忽略现实环境。<sup>[20]</sup>有学者认为,随着“不在场的在场”的扩张,个体最终会遗忘出现在他们周围的物理现实,就像已经发生的一些情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餐厅里、在街上,人们“在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的维度中”,像是在对自己聊天、嬉笑、大声嚷嚷以及争论。<sup>[21]</sup>

实证研究说明,Gergen 等人对移动通信技术带来注意力分化的担忧是有必要的。Banjo, Hu & Sundar 在行为实验里观察到,手机使用降低了社会互动的可能性,通话中的参与者很少愿意对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研究者猜测是因为手机使用分散了用户对周围公共环境的注意力,导致其忽视了必要的社会责任。<sup>[22]</sup>目前看到的研究主要基于手机通话,一般情况下打电话需要耗费人们更多精力,对公共空间的侵扰更明显,浏览手机新闻、使用社交软件、打游戏听音乐等新型手机行为私密性更高,对他人的干扰更少。但是,近期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些看似介入性很低的手机使用同样会影响社会交往的质量。

Hatuka & Toch 认为,相比普通手机,智能手机降低了用户对所在公共环境的归属感。具体表现在,智能手机用户更少进行社会互动(交谈、观察),更难以描述所在的物理环境,对整体的社会环境不够敏感等。<sup>[23]</sup>另有研究者在对话实验中发现,注意力集中程度对交谈双方对信息内容和谈话对象的主观判断起决定作用。无论对于听者或说者,当倾听者的注意力在手机上的时间越少,双方会越觉得故事内容有趣且吸引人,对对方有趣程度、吸引程度的打分也会越高。<sup>[24]</sup>还有心理学实验证明,只要谈话场合中有手机在场,哪怕在没有人使用的情况下,都会影响人际交往的密切程度,彼此的信任感、理解程度等等。尤其当谈论的话题是对亲密感、信任感要求比较高的个人话题,手机在场的这种无意识影响更为显著。<sup>[25]</sup>

不过,并不是所有研究结果都支持手机对社会互动有反效果作用,Campbell & Kwak 通过邮件、电



话、网络问卷调查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等移动通信技术的情况，以及这些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人们在公共场所与陌生人的交流。出乎研究者预料，手机在公共场所的普遍使用并未弱化与陌生人的交往，他们发现以浏览新闻为目的的手机使用会增加在公共场合与陌生人交谈的概率，而以社交联系为目的的使用则会减少这种交流。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用手机看新闻、手机使用频率高的受访者在公共场合更愿意与陌生人谈话。<sup>[26]</sup>该研究是少数以手机用户为中心来检验人际互动效果的实证案例，得出的结论与大多数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尽管调查用户使用哪些手机功能，涉及媒介传播内容，偏离开篇设定的技术作为本体的取样前提，但还是提示了研究人们如何使用移动技术的必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对这项技术所传播的内容研究才能实现。总的来说，目前尚无法确认移动通信技术是否会对公共空间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如 Campbell&Kwak 所言手机使用或许可以拓展公共交往的广度，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不在场的在场”现象将会降低人际互动的质量与深度。

## 五、结 论

媒介环境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对任何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sup>[27]</sup>。的确，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超过了它的传播内容。影响力的核心来自手机本质上具备的移动性和连接性，一方面保持了私人空间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却打破了私人空间与其所处特定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造成了公共空间或主动或被动的私人化倾向。<sup>[28]</sup>伴随着空间的重新定义，场景中的人们也在重新调整彼此的传播互动。通过感知公共场景，人们限定自我和他人的规范行为；混合场景的演化，为人们社会交往提供一个动态的表演舞台；注意力的时空分化，或将威胁到物理环境里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新的接近的可能性提高，意味着私人空间的介入可能使个人获得更大的主体性，而亲近程度的下降，则是对个体自由持续扩张的一个提醒。

从技术出发，未必代表了“媒介决定论”的思维模式，真正的目的是要在研究中认识和分析人们在使用这项技术并受其影响过程中的主体性变化。这些微观的、独立的研究个案和所涉及的复杂面向连缀指向了一个趋势：这个世界具有如此丰富的个体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人们却倾向于使用一种可识别的、一致的和普遍的模式，依赖一套共同的策略或原则来运作移动技术。<sup>[29]</sup>沿着这条线索，对于传播理论学者来说，未来需要审视这一现象，从更宏观的全球化、市场化因素提供概念化的解释；实证研究者可以从更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探寻，抽丝剥茧地解读移动传播的使用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解密移动消费者的套路：2016 德勤中国移动消费者调研 [EB/OL]. <https://www.deloitte.com/cn/zh/pag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articles/2016-global-mobile-consumer-survey-china-edition.html>, 2017-8-5.
- [2] Ling, R. (2004).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 Publishers.
- [3] 胡春阳. 寂静的喧嚣 永恒的联系：手机传播与人际互动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4] [美]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
- [5]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 [6] Campbell, S. W. (2007).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perceptions and uses of mobile telephony, *New Media and Society*, 9 (2): 343-363.
- [7] Campbell, S. W. (2007). Perceptions of mobile phone use in public setting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 (1): 738-757.

- [8] Campbell, S. W. (2008). Perceptions of Mobile Phone Use in Public: The Roles of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Focus of the Setting. *Communication Reports*, 21 (2): 70-81.
- [9] Opoku, R. A. (2017). Attitudes towards mobile phone usage in public places among young Saudi adults. *Mobile Communications*, 15 (3): 235-251.
- [10] Han, B. (2011). Perceptions of mobile phone use in public settings: Factors influencing mobile phone use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5 (2): 173-205.
- [11] Nickerson, R. C., Isaac, H. & Mak, B. (2008). A multi-national study of attitudes about mobile phone use in social settings. *Mobile Communications*, 6 (5): 541-563.
- [12] Okabe, D., Matsuda, M. & Ito, M. (2006). Keitai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Ito, M., Okabe, D. & Matsuda, M. (eds.),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5-217.
- [13] [美] 约舒华·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肖志军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31-33.
- [14] 季念. 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手机与时空关系研究述论 [J]. 文艺研究, 2008 (12).
- [15] Katz, J. E. (2006).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ily life: the next phase of research on mobile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19 (1): 62-71.
- [16] Humphreys, L. (2005). Cellphones in public: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 wireless era. *New Media & Society*, 7 (6): 810-833.
- [17] Hopper, R. (1992).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8] Kubey, R. (1992). A critique of No Sense of Place and the homogenization theory of Joshua Meyrowitz. *Communication Theory*, 2 (3): 259-271.
- [19] [美] 保罗·莱文森. 手机: 挡不住的呼唤 [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83.
- [20] Gergen, K. J. (2002). 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 in Katz, J. & Aakhus, M.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7-241.
- [21] Greenfield, S. (2007). *Tomorrow's people: how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nd feel*. London: Allen Lane.
- [22] Banjo, O., Hu, Y & Sundar, S. S. (2008). Cell phone us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proximate others: ringing in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Open Communication Journal*. (2): 127-135.
- [23] Hatuka, T. & Toch, E. (2016). The emergence of portable private-personal territory: Smartphones, social conduct and public spaces. *Urban Studies*. 53 (10): 2192-2208.
- [24] Lopez-Rosenfeld, M. et al. (2015). Neglect in human communication: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cell-phone interruptions in face to face dialogs. *PLoS ONE*. 10 (6): 1-9.
- [25] Przybylski, A. K. & Weinstein, N. (2012). Can you connect with me now? How the presenc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s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0 (3): 237-246.
- [26] Campbell, S. W. & Kwak, N. (2011).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linking patterns and places of use to engagement with others in public.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 207-222.
- [27] [美]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 [M]. 何道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9.
- [28] 王佳煌. 手机社会学? [M]. 台北: 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5: 137.
- [29] Katz, J. & Aakhus, M. (2002). Conclusion: making meaning of mobiles - a theory of Apparategeist. in Katz, J. & Aakhus, M.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1-318.